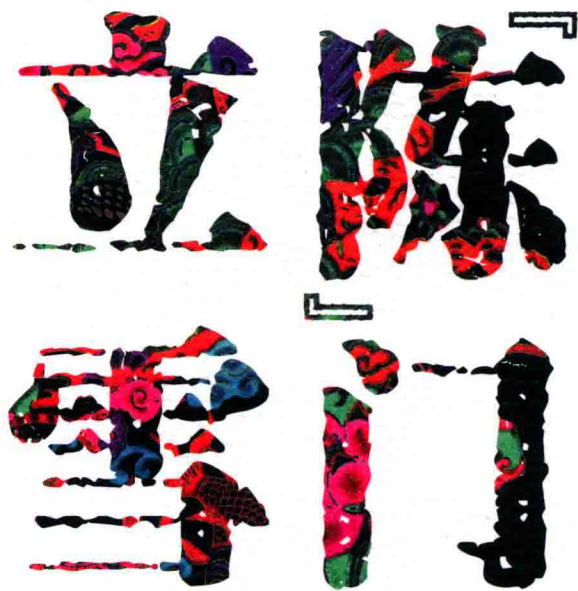


尹笑非
郑土有
——
主编

文艺民俗学
研习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尹笑非

郑土有

——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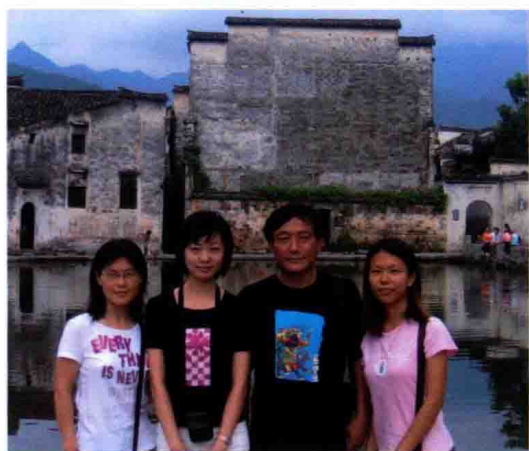
『陈立雪』门

文艺民俗学

研习录



2002年1月1日，陈勤建老师带领博士生廖海波（左二）、毛巧晖（左一）等在浙江上虞祝家庄调查梁祝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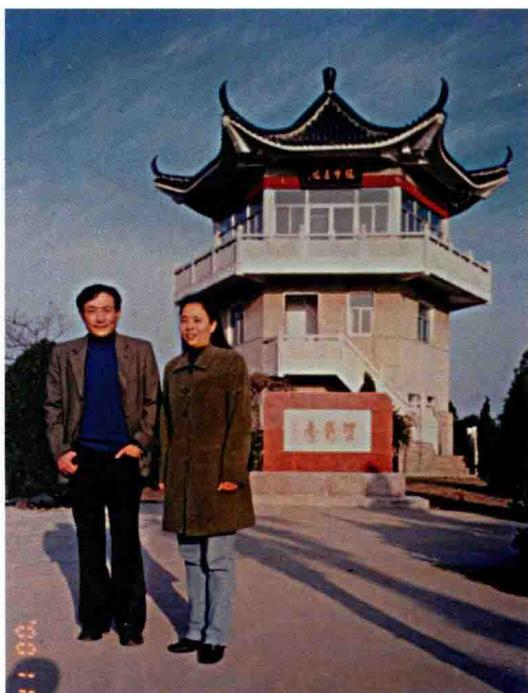
2004年1月，带领研究生在安徽宏村调研（左起：刘颖、尹笑非、胡颖）



2009年11月24日，陈勤建老师带领2012届硕士生
在宁波市它山堰调研（左起：陈成、章瑜、刘颖）



2003届博士论文答辩会，李小玲（左一）、廖海波



2005届博士柯玲2000年11月28日与陈勤建老师
摄于盐城



2004届博士生郑土有毕业合影



2005届硕士袁瑾（左一，2011届博士）、许思悦（博士在读）硕士毕业时与陈勤建老师合影



2007届博士戴岚毕业合影

2007届博士毕业合影，
前排左起华霄颖、尹笑
非、周晓霞，后排右二
戴岚



2009届博士衣晓龙毕业合影



2009届硕士生毕业答辩会（左起钱炜蕾、郭
竞、孙伟、周华、刘迎曦、毛玲莉）



2010届博士毕业合影，左起叶静、潘倩菲、沈
玮



2012届博士论文答辩会，李云安（左一）、田
素庆（右二）、毛海莹（右一）



2012届硕士、博士生与陈老师、师母合影（前排博士左一田素庆，右一毛海莹，后排硕士左起刘颖、陈成、王超）



2013届博士毕业合影，全仙英（左四）、黎亮（左三）、霍九仓（右四）



2013年黎亮博士论文答辩与陈老师合影



2006年4月3日中国民俗学会第六届代表大会期间，陈勤建老师与参会学生合影，前排左起：郑土有、黄景春、陈勤建、柯玲，后排左起常峻、沈玮、戴岚、宣炳善



2016年4月15日陈老师、师母（左二）与学生郑土有（左一）、毛海莹（右一）在2016东亚非遗展合影

2012年11月陈勤建老师带领博士生（左起：杜静怡、黄草棉、沈梅丽）参加绍兴大禹祭典田野调查



2016年中国民俗学会年会期间陈勤建老师与参会学生合影（左起：钱晨、梁珊珊、袁瑾、李小玲、陈老师、毛巧晖、宣炳善、黄亚欣、杨璟琰）



陈勤建老师带领博士生兰晓敏（左一）、梁珊珊（右一）参加2017绍兴“水乡社戏”保护工作研讨会



2017年6月10日陈勤建老师应邀在上海市非遗中心做二十四节气讲座，与学生合影（右起：梁珊珊、钱斌、钱张帆、茅正圆、郭竞、陈老师、刘霞、钱晨、吴凡、梁景宰、张文灿）



2012年11月博士生霍九仓在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交流



2017年8月博士生兰晓敏在陈老师办公室



2016年10月5日博士生黄亚欣在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交流期间与内田青藏（左）、佐野贤治（右）教授合影



2013年6月陈勤建老师带领留学生黄草棉（前排右三）等在新场古镇参观考察



2017年3月5日学生为陈老师七十岁祝寿（右二为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何彬教授）



2018年3月5日学生及家属为陈老师做生日



2018年春节学生给陈老师和师母拜年

2018年3月陈勤建老师荣休仪式上学生献花（左起：周晓霞、陈老师、华霄颖、尹笑非、李小玲）



前言

今年是家师陈勤建教授七十寿诞，又值执教鞭四十二年后荣休之际。师门同学商议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庆贺恩师的寿诞和荣休？我提出了编辑本书的动议。每位师门同学的毕业论文，既是三年学习成果的汇报，也凝聚了老师的心血。将每位同学毕业论文中的精华部分汇集成册，既体现了师门的学术理路和成果，也是对恩师的最好回报。

家师陈勤建教授是我国民俗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国民俗学》《文艺民俗学导论》《中国鸟文化》等专著，以观点新颖、具有原创性而受到学界的赞誉。尤其是文艺民俗学分支学科的创立，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勤建的民俗情结源于上海市郊三林塘（现已划入浦东新区）的那所老房子。他的祖上是做皮货生意的，经济上属小康水平，留下了这所江南水乡典型的宅院。童年时期的他就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里，听爷爷奶奶讲故事，目睹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频繁的祭祀活动，在后院的竹林里与兄弟姐妹玩捉迷藏……童年时期家乡的民俗在他的意识深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从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也有所反映。如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在《采风报》上发起过一场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的“浦东大娘子”习俗讨论，就是以他家乡的习俗为背景的。在他的书中，也经常以浦东的民俗为实例。

正当他雄心勃勃准备进入大学深造的时候，与成千上万同龄人一样，跨入了上山下乡的行列。从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了白雪

皑皑的东北，投身到了北大荒的建设之中。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顽强的意志，人生的波折培养了他勤于思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十年北大荒的生活，使他通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在北大荒，他垦荒种地，扛枪巡逻，当过班长、排长、连长，做过师部通讯员。以后有机会上大学，他的志愿是学习航天技术，将来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贡献，可他偏偏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选中，这阴差阳错也许少了一位航天专家，却多了一位民俗学专家！

陈勤建真正接触民俗，是从田野调查资料开始的。198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现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办《采风报》，他受聘担任民俗版的编辑（以后担任主编十多年），来稿大多是作者实地调查的民俗资料，因此在编辑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大量的民俗资料，这为他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他与其他纯书斋学者不同的地方，为他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打下了伏笔。

1980年代他先后参加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民间文学讲习班、民俗学讲习班，接受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知识的系统培训。返校后，就开设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选修课，并开始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工作。1989年，他的《中国民俗》一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正如他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一开始，我便想打破老框框，在我个人学习领悟的基础上，运用经过重新构建的民俗学基本理论，来融化从采风实践中得到的民俗事象，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展示中国民俗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形象资料。”他在书中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该书一出版便在民俗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位著名民俗学家称赞该书是“第一次突破了过去中国民俗学理论建构上的若干不成文的‘模式’——学界内关于‘民俗学’的民俗模式”。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因为1979年民俗学学科恢复的时候，理论和研究人员的准备都不足，大部分研究者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转向民俗学研究的，先前出版的几本民俗学概论书，其理论框架也基本上承袭了民间文学的理论框架，虽然有或多或少的修正，但终究是先天不足，离具有中国民俗自身特色的民俗学理论体系相距甚远。《中国民俗》一书的出版无疑给当时的民俗学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无论是学术用语，还是理论概括，篇章安排，都是崭新的，具有独创性。如提出民俗是一种没有明文约定的规矩，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无形之中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不成文规矩”“模式化规矩”“群体化规矩”是民俗

的三个基本特征：“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文化与生活的双重复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间环节”是民俗的本质；“法约性”“软控性”“本位偏移性”是民俗的三个性能。这些都是发前人所未发，具有独特的创见性。时至今日，书中的许多学术用语、观点，已被许多学者接受和引用；在整体的民俗学理论框架上，至今仍有其独特的价值。

对民俗学的基本理论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构架后，陈勤建开始着手文艺民俗学的研究工作。研究初始，异常艰苦。虽然从“五四”以来就已有不少学者论及文艺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但大多是零碎的、感悟式的，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是前无古人的事，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理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白手起家。好在他也具备有利的条件：一是多年任教文艺理论，对文艺创作规律、文艺批评模式、各种流派的文艺理论等有较深入的理解；二是在北大荒期间通读了大量哲学原著，打下了扎实的哲学基础；三是通过多年的探索，对民俗学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构架。这三方面的优势为他创建文艺民俗学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1991年《文艺民俗学导论》出版，该书从文艺学和民俗学契合的视角，探讨研究了文艺与民俗的关系这一前人感觉到而尚未认真研究和重视的课题，为文艺研究和创作实践开拓了视野，是一部拓荒性的理论专著，从而创建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由于它的开拓意义，获得了教育部二等奖，入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著纲要》，许多报刊都作了专门介绍。并被许多大学定为研究生教材。

该书认为，从深层的结构观察，文艺民俗学的建构，在于民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文艺学和民俗学所研究的对象有着内在的同一性。按照现代民俗学的眼光，民俗是人生的一种永恒的伴侣，在群体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其语言、心理、行为不可避免地打上民俗的烙印。文艺学以人为自己的主要描写对象，民俗学则以人的民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文艺要描写人，离开了人的民俗，人物形象就欠准确、真实和生动。人的情感，并不是某种传声筒式的抽象物，也不是某一特定情态的翻版，它有着一定的结构层次，伴随人生蕴藏丰富的民俗文化是支撑其生命的内核。文艺刻画人，不揭示制约人主体情感的民俗因素，就不能真正勾勒出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民俗与人生的难分难解，势必左右着文艺对人生的勾勒。民俗与文艺在表现人的问题上有着同类的复合和交叉影响。在发生学中，民俗

与文艺都经历了主体心理机制与客体事物之间反复的双向交流，同样需要情感的激发和事象的展现，形成了特殊的联盟，人类社会文艺发生阶段，文艺与民俗有着母女般的血缘联系。文艺到了专门家手里，独立发展了，可是民俗母体对她的滋润和影响，始终未能中断。任何文艺，在总体上都受到一定民俗文化的制约，世界上不存在超越人类民俗文化的文艺作品。该书在上述基础上冲破了以人性情感为主的人本主义人学观的藩篱，提出了人是以民俗为核心文化存在的人学观念，它构成了文化人性的内在基因，人的文化生命的DNA。这一见解，较之文化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家格罗塞、罗特哈克、卡西尔等更前进了一步。该书在考察了原始文艺的无定型混同结构和民俗存在及初生态民俗内在文艺机制之后，论断：“人类最早的文艺出自与审美无关的动机，表现为一定功利性的民俗存在，而原始初生态的民俗中又存在着文艺起源的内在的文艺机制，由此而孕育了文艺的萌芽。文艺的起源，经过了原始初生态民俗的中介过渡，这才是人类文艺起源的真实面貌。”从而较准确地阐述了文艺学中众说纷纭的一个命题。对整个文艺学研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补缺，大胆的开拓。

陈勤建擅长于宏观的民俗理论研究，很少做个案或具体民俗事项的研究，但20世纪90年代却对鸟信仰着了迷，每次外出总要拍些老房子屋顶上、瓦当上的“鸟”的情影，日积月累，终于磨出了《中国鸟文化》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荣获了1998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该书以当今民间现存的遗风遗迹为追踪点，在广泛田野作业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就中国凤鸟传说与信仰的源起、发展以及它对中国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民族融合和形成的作用，提出了颇新的见解。他认为：以凤鸟为主体的传说信仰文化，远在七八千年以前的中国就已广泛流传，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更为突出。它源起于早期的稻作生产，江南地区的原始初民“从鸟食——野生稻食用中得到启迪，从鸟田——鸟类觅食习性——野生稻滋生地得到感悟”，发现和发展了原始的稻作生产。反过来，初民生存的依赖与稻谷发生了密切关联后，又情不自禁地对带来稻谷的鸟类产生了特殊的崇敬之情，整个生活发生了“鸟化”现象：吃鸟食，种鸟田，住鸟居，用鸟饰，穿鸟衣，说鸟语，使鸟文，立鸟竿，树鸟徽，对鸟的崇信占据了他们的的心灵世界。在原始思维互渗律的观照下，初民将鸟类的日出而飞，日落而息，和太阳的朝起夕落，联系在一起，使鸟信仰又成为复合的太阳鸟信仰，从

而为多种形态的太阳鸟的出现，特别是为以鸡为原型的凤鸟传说信仰独占鳌头奠定了基础。流传至今的凤凰崇信就是其一脉相传的。他认为在稻作生产中产生的以凤鸟为主体的太阳鸟信仰，以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和中心地，以后由南到北，传向全国的。

该书是国内第一次在现代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文艺学等多学科综合分析研究基础上，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凤鸟信仰的发生机制及数千年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为我们认清国人固有的思想情感和文化意识的原型及发展，中国文明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广泛的意义。该书在学术上也有多处突破。它在国内外率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科学分析了对中国思想文化艺术影响极大的凤鸟信仰在初民稻作生产形成发展中逐步萌生、成长、传播的历史文化轨迹；第一个将稻作生产引发的凤鸟信仰与中国的仙道思想观念、仙话及老庄哲学和文学串联起来，为研究中国思想的起源、中华民族的融合提供了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实例；第一次将凤鸟信仰的多种变型联系起来，加以科学地说明；第一次从中国江南稻作文化的传播和鸟信仰的流传中找到了日本文化鸟（日）信仰发生发展的情结。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我国兴起了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陈勤建教授全身心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实践指导，参与上海市非遗项目的评审工作和有关法规条例的制定，长期参与文化部组织的非遗评审和检查工作，是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领域的主要学者之一。在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同阶段都提出了许多富有独特见解的观点，其中既有对非遗保护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也有针对某一特定非遗项目保护的深入研究；既有对非遗保护方法的精辟缕析，也有对某一非遗项目保护的具体策划。如早在2005年在苏州召开的首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上就提出了非遗保护的“原真性”“整体性”原则；2006年的第二届论坛上提出了“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问题，此后又相继提出了非遗是文化的DNA、文化生态区的整体性保护、区域联动保护、非遗的生活回归等重要命题，在非遗保护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上我们回顾了陈勤建教授的学术经历，重点分析了他从事民俗研究的三个阶段（民俗基本理论构架阶段、文艺民俗学创建阶段、民俗个案研究阶段）和非遗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综观陈勤建教授的学术研究，我们发现四个显著的特征：一是理论概括能力强，如他

对民俗特征、民俗本质、民俗性能等的归纳都反映了这方面的特长；二是思想活跃，理论创新能力强，他往往能将一些旁人看来毫无关联的事项联系在一起，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如他论述龙与闪电、鸟信仰与稻作生产、仙道思想的关系等，无不闪现了这种思维的火花；三是强烈的现实感、责任感。这是他一贯的学术主张，也是一个学者最可贵的精神。这在他构建民俗学基本理论时就有清晰的认识，如谈到民俗的法约性时，指出民俗的法约性是一种与法律并存但不一定一致的惯制形式，甚至无法用法律的概念和语言理解它，它不是靠明确的条文，而是靠人们的习惯心理和群体力量来维系的，具有一种威力很强的惯性动力。这种惯性的动力是难以靠单纯的法律行政手段来消除的，还需要有移风易俗的整体方案，这不仅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也是民俗学者共同的任务。谈到民俗的软控性时他说，民俗在国家的管理中，相对于政令法律，是一种软件，但它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尤其是在《中国民俗》第八章中用了大量实例论证民俗在国家管理、经济生活、外贸出口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后他又相继发表了《民俗的特质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20世纪上海民间文艺民俗研究走向》等文章，积极倡导民俗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还作为民俗顾问积极参与上海的经济建设，如为龙华古镇、青浦古镇朱家角、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的开发以及陈云故居的修复工程献计献策，体现了一个民俗学者的时代责任感。而在非遗保护的研究中，这种学者的担当表现更为突出。四是明确的学科建设意识，我们从陈勤建教授已出版的几本专著中可以看出，他的民俗研究，不仅有深度，而且有高度，即他的研究始终是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来进行，围绕着学科建设而展开的，体现了一位著名学者的学术前瞻性和全局观念。

作为学生，虽然师门同学都十分努力勤奋，但限于知识结构、学术积累的不够，能够学到的仅仅是老师思想中很少的部分。本书按照内容大致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编是文艺与民俗的关系问题研究，是文艺民俗学学科思想的总论部分。涉及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家、思想家民俗思想的梳理，时间跨度从清末到21世纪民间文艺思想的挖掘；民俗与文学创作、叙事、女性创作的关系；以及对文艺民俗学自身发展的观照。第二编是对文学中特殊门类民间文学的研究。聚焦神话、童话、民间故事、叙事山歌等。第三编是艺术与民俗的关系研究。从文艺民俗学角度对民间手工艺、民居、年画、

戏曲、吉祥图案等各民间艺术门类的深入探析。第四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关系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学的天然联系使得民俗学承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研究职责。本编的内容从非遗具体案例入手，探讨城镇化进程下非遗的生态与传承等基本问题。

书名《“陈”门立雪：文艺民俗学研习录》，借用了“程门立雪”的典故，表明我们虚心求学、光大师门学术传统的心志，同时这本集子也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成熟的习作，希望得到方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本书在编辑的过程中得到师门同学的大力支持。由于时间和各方面原因，有部分同学的论文未能收入，敬请见谅！本书编辑工作由我和尹笑非总负责，毛玲莉、郭竞负责稿子收集、汇总和初步编辑，沈梅丽、尹笑非负责稿子的审核，钱斌负责书稿的格式编辑，由我统稿。

最后祝家师陈勤建教授身体健康、学术之树常青！

郑土有

2018年2月12日